

钱起诗歌系年补遗

王定璋

钱起诗歌的系年是我在整理、注释《钱考功集》时的主要工作之一，由于直接有关钱起的资料甚少，诗歌之系年时断时续，难以一气呵成。反复把玩钱起诗歌及有关资料，偶有所得则立即记录备忘，喜不自胜，日积月累，不觉又可成篇，姑名之诗歌系年补遗。敝帚自珍，不揣浅陋，书之以献同好，并以此就教于方家。

《题陈季壁》（《钱考功集》卷四，《全唐诗》卷二三七）
天宝六载。

《全唐诗》卷二〇四收陈季诗二首，并附小传：“陈季，天宝十五年及第，”陈季诗二首中即有《湘灵鼓瑟》：“神女泛瑶瑟，古祠严野亭。楚云来泱泱，湘水助清冷。妙指微幽契，繁声入杳冥。一弹新月白，数曲暮山青。调苦荆人怨，时遥帝子灵。遗音如可赏，试奏为君听。”按《文苑英华》卷一八四《省试诗》下辑有钱起所作《省试湘灵鼓瑟》，和陈季、魏瓘、庄若讷、王邕等人同题之作。陈季之诗与钱诗不仅同题，而且同韵。徐松《登科记考》卷九据此列陈季为钱起之同榜进士是有根据的。可见陈季及第之年当为天宝十载而非如《全唐诗》所记之天宝十五载。

钱起《题陈季壁》诗有：“郢人何苦调，饮水仍布衾。烟火昼不起，蓬蒿春欲深。前庭少乔木，邻舍闻新禽。虽有征贤诏，终伤不遇心。”诗中一派潦倒穷困之景，显系二人皆处于落魄窘困之时。结句值得注意：征贤不遇！检《资治通鉴》卷二一五天

宝六载：“上欲广求天下之士，命通一艺以上皆诣京师。李林甫恐草野之士对策斥言其奸恶，建言：‘举人多卑贱愚聩，恐有俚言污浊圣听。’乃令郡县长官精加试练，灼然超绝者，具名送省，委尚书复试，御史上丞监之，取名实相副者闻奏。既而至者试以诗、赋、论，遂无一人及第者。林甫乃上表贺野无遗贤。”这样的“征贤诏”，实在是个大骗局，学识文才出众如杜甫、元结者皆未入选。元结在《喻友》中云：“天宝丁亥（六载）中，诏征天下士人有一艺者，皆得诣京师就选。相国晋公林甫，以草野之士猥多，恐漏泄当时之机议，于朝廷曰：‘举人多卑贱愚聩，不识礼度，恐有俚言，污浊圣听。’……已而布衣之士无有第者，遂表贺人主，以为野无遗贤。”奸相李林甫一手遮天，欺上压下，无一人及第，则钱起、陈季等人“终伤不遇”是再自然不过的了。鉴于钱、陈二人皆于天宝十载入选及第，故系此诗于天宝六载。若系于天宝七、八载，应征贤诏已过二三年，印象淡漠，激愤之情归于平淡，似无缘作诗遣愤。诗中愤懑之情溢于言表，当为初受骗时心迹之流露。

《酬刘员外雨中见寄》（《钱考功集》卷四，《全唐诗》卷二三七） 作于大历三、四年间。

此刘员外即诗人刘长卿。刘长卿，据中唐高仲武称其“有吏干，刚而犯上，两遭迁谪。”（《中兴间气集》卷下）今人傅璇琮考刘之两遭迁谪，一为至德三年由长洲尉贬南巴尉；一为大历八年至大历十二年间因吴仲孺之诬害由淮西鄂岳转运留后贬为睦州司马（详《唐代诗人丛考·刘长卿事迹考辨》）。考证精辟，可信从。应当补充的是刘长卿在大历三、四年间已在长安，且为员外郎了。杜鸿渐于大历二年从成都还京，大历三年八月本来任命杜为“东都留守，充河南、淮西、山南东道元帅，平章事如故。以疾上表乞骸骨，从之，竟不之任。四年十一月卒。……鸿渐晚年乐于退静，私第在长兴里，馆宇华靡，宾僚宴集。鸿渐悠然赋诗：‘常

愿遍禅理，安能挹化源。’朝士多属和之”（《旧唐书·杜鸿渐传》）。所谓朝士多属和之，从《全唐诗》可知除了李嘉祐，皇甫曾等人有诗与杜唱和外，钱起有《奉和杜相公移长兴宅奉呈元相公》诗（《钱考功集》卷六，《全唐诗》卷二三八），刘长卿亦有《奉和杜相公新移长兴宅呈元相公》诗（《全唐诗》卷一四九）。二人之诗题目相同，且皆为五言排律。钱诗云：“守贵常思俭，平津此意深。……种蕙初抽带，移簟不改阴。……觉路经中得，沧洲梦里寻。……兴来文雅振，清韵掷双金。”一派春暮景象，且与杜鸿渐佞佛切合。刘诗有：“间世生贤宰，同心奉至尊。功高开北第，机静灌中园。……献替常焚稿，优闲独对萱。花香逐荀令，草色对王孙。”诗中所言时令与钱诗相合，内容同为颂扬杜功德名望，可见钱、刘二诗当为同时在京之作，钱、刘之间不仅相识，而且彼此诗歌酬唱，同为杜鸿渐家宴之座上客。故知钱起《酬刘员外雨中见寄》中之刘员外即刘长卿，此诗与钱、刘二人同杜鸿渐唱和之章为先后之作，均作于大历三、四年春。

《秋夕与梁锜文宴》（《钱考功集》卷四，《全唐诗》卷二三七）天宝十一、二载。

梁锜生卒年不详，芮挺章《国秀集》称其为“执戟”，选诗二首。《全唐诗》辑梁锜诗十五首，《小传》云：“梁锜，官执戟，天宝中人。”甚简略。从李颀《别梁锜》诗中我们可以获知梁锜性格倜傥不羁，四十尚无爵位，颇落魄不得志也。梁锜也曾从军边庭，但无建树。天宝中、晚年梁锜在长安任职，这不仅从钱起《秋夕与梁锜文宴》可以得到证明，且岑参有《题梁锜城中高居》也可为证。钱起天宝十载及第后即在长安秘省校书，约在天宝十三、四载即转赴蓝田县尉。而岑参十一载即从安西返京，十二载也在长安，天宝十三载始离长安赴北庭为封常清幕中任职（详陈铁民、侯忠义《岑参年谱》，载《岑参集校注》）。而李颀与梁锜之交往，亦在天宝十载前后，此时梁锜任执戟在京。李颀

曾于吏部侍郎达奚珣之夫人寇氏卒时有诗挽悼，即《达奚吏部夫人寇氏挽歌》（《全唐诗》卷一三四），达奚珣为吏部侍郎乃在天宝六载末，而其妻寇氏之卒应在天宝九、十年间（详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李颀考》）。傅璇琮考证李颀在天宝六年或稍后几年来过长安，极确。将以上所考综合起来，钱起之《秋夕与梁锺文宴》当作于天宝十一、二载钱起在京之时，此时梁锺、岑参、李颀等人均在长安。

《山园秋晚寄杜黄裳少府》（《钱考功集》卷六，《全唐诗》卷二三八）此诗与《山下别杜少府》（《钱考功集》卷七，《全唐诗》二三八）为先后之作，此杜少府即杜黄裳少府，二诗当作于宝应二年末至广德初。

杜黄裳，两《唐书》有传，《新唐书》本传谓：“杜黄裳字遵素，京兆万年人。擢进士第，又中宏辞。郭子仪辟佐朔府，子仪入朝，使主留事。李怀光与监军阴谋矫诏诛大将军，以动众心，欲代子仪。黄裳得诏，判其非，以质怀光，怀光流汗服罪。……入为侍御史，为裴延龄所恶，十期不迁。贞元末，拜太子宾客。……”《旧唐书》所载略同，但皆未言黄裳为少府事，当为史料阙载。循之常例，杜之为少府（县尉，不过八、九品官秩），必为入郭子仪幕为从事之前（从事品秩不定，但最低也不会低于七品，子仪入朝时可主留事者，品秩必然会高于七品）。而据徐松《登科记考》卷十宝应二年下及第者有杜黄裳，并谓：“《旧书》本传：‘登进士第，宏词科。’《柳宗元集》注：杜黄裳字遵素，京兆杜陵人，宝应二年中进士第。”按《卓异记》载座主见门生知举，有肖昕、杜黄裳，是黄裳为昕门生。”杜黄裳入郭子仪幕之确切年代虽不可考，而从《新唐书》杜黄裳传可知，杜离郭幕后即入台省为侍御（从六品下，详《新唐书·百官志》），黄裳必然不会此时再去作品秩较低的少府，因杜在郭幕留事朔方期间处理李怀光矫诏事显示吏干，被擢拔入朝为侍御史，既与《旧唐书》

本传相合，也在情理之中。可见杜之为少府乃释褐入仕之发轫，时在宝应二年至广德元、二年间。寻绎钱诗《山园秋晚寄杜黄裳少府》中之“惆怅佳期阻，园林秋景闲。……杖藜仍把菊，对卷也看山。望望佳期阻，非君谁解颜。”此时已是钱起在蓝田尉任上的最后一段时间了，所谓山园，即钱起在蓝田之旧居。

《县中池竹言怀》（《钱考功集》卷六，《全唐诗》卷二三八）广德元年秋。

钱起生平由于资料匮乏，很多细节是颇模糊的。但他入省为司勋员外郎的时间是比较清楚的。他的《题郎士元半日吴村别业兼呈李长官》诗（《钱考功集》卷八，《全唐诗》卷一三九）中有：“半日吴村带晚霞，……愁人昨夜相思苦，闰月今年春意赊。自叹梅生头似雪，却怜潘令县如花。”提供了重要线索。诗中作者自比梅生（福），则说明钱起此时还在蓝田尉任上（王莽时梅福曾为南昌，诗以此取喻），又比郎士元为潘岳（潘岳为河阳令，遍种桃李，有“河阳一县花”之誉，详《白孔六帖》），而宝应二年正好闰正月，因此才有春意迟之叹。亦即宝应二年（即广德元年）春，钱起还在蓝田尉任上是确定无疑的。我们又可从钱起《登刘宾客高斋》诗推知他入尚书省为郎官的时间。此刘宾客即理财家刘宴，从钱起在诗题下自注：“时公初退相”，可知刘宴由宰相罢为太子宾客乃广德二年春之事。（详《钱起部分诗歌系年》，《文献》第22期）。从钱起这两首诗（《题郎士元……》与《登刘客宾高斋》）即可确定钱起入尚书省之时间为广德元年春以后，广德二年春之前。玩索《县中池竹言怀》中：“官小志已足，时清免负薪。卑栖且得地，荣耀不关身。……道在即为乐，机忘宁厌贫。却愁丹凤诏，来访漆园人。”最后两句尤其值得注意。所谓“丹凤诏”即皇帝的诏书。《十六国春秋》载石季龙在台上有诏书，以五色纸著凤凰口中，凤既衔诏，侍人放数百丈绯绳，辘轳回转，状若飞翔，飞下端门。凤以木作之，五色文身，足皆用金。（转

引自王琦《李太白集》卷五）因此称皇帝的诏书为凤凰诏、丹凤诏。据“却愁丹凤诏”二句可知，此时当为朝廷已下诏征钱起入朝，且此消息已为钱起所知，诗人才有所谓“来访漆园人（庄周尝为漆园吏，诗人以此自况）”之“愁”的。如果朝廷没有擢升钱起入朝之诏，这“愁”是无从愁起的。钱起在此诗开头即道“官小志已足”似乎诗人对于一縑黄绶的处境心安理得。其实不然。他在《喜李侍御拜郎官入省》（《钱考功集》卷五）诗中分明有：“汉主前瑶席，穰侯许凤池。应怜后行雁，空羡上林枝”之叹，对李侍御的升迁十分羡慕，并冀李入朝为之援手汲引。而在此诗中却说“官小志已足，时清免负薪”云云，益可证明钱起作《县中池竹言怀》诗时已获悉调自己入朝之诏书已下，才有“官小志足”，及“来访漆园人”之愁的。如前所述，钱起广德初闰正月时还在蓝田尉任上与郎士元唱和（见《题郎士元半日……》），而广德二年春已在京任郎官，而《县中池竹言怀》中有：“荷香度高枕，山色满南邻。”明为夏日光景。故钱起升擢尚书省当在广德元年夏秋之交，《县中池竹言怀》当作于广德元年夏。而钱起之擢升入朝疑为李侍御之援手，而《喜李侍御拜郎官入省》诗殆作于稍前于此之宝应二年秋。

《罢官后酬元校书见赠》（《钱考功集》卷八，《全唐诗》卷二三八）天宝十二、三载间。

钱起于天宝十载及第释褐后即校书秘省（《旧唐书·钱徽传》），据现存极少的资料记载，尚未见其罢官经历，而《钱考功集》卷二之《初黄绶赴蓝田县作》中之“初黄绶”及诗中之“一叨尉京甸，三省惭黎元”等值得研究。既然钱起仕途发轫于秘书省校书郎，那这里的“初黄绶”则不当为入仕后之最初任职。这个矛盾如何解决？寻绎《罢官后酬元校书见赠》可以得到答案。诗云：“……自我辞丹阙，惟君到故庐。忘机贫负米，忆戴出无车。……临流仍挥手，知音未弃余。”诗言“辞丹阙”，则刚离在京

所任之职，所谓“惟君到故庐”，即指彼时的同事元校书仍不忘故旧，来故居探望。因此，可知钱起所罢之官乃秘书省校书郎。至于因何故去职，去职后又怎样复职，限于资料，皆未得而详。殆钱起罢官后不久又被任命为蓝田县尉，在赴任时即赋《初黄绶赴蓝田县作》诗。而此诗系于天宝十四载（详《钱起部分诗歌系年》，《文献》第22期），则钱起《罢官后酬元校书》当作于此诗之前之天宝十二、三载之际。因钱起中、晚年并无罢官经历，且中、晚年之钱起境遇优渥，断无“邻犬吠初服，家人愁斗储”，“忘机贫负米”之窘困。

《送襄阳卢判官襄开河事》（《钱考功集》卷七，《全唐诗》二三八）广德二年。

钱起诗中所谓开河之事，循之唐史当有以下几桩：“开元十八年六月，令范安及、韩朝宗就灋、洛水源流决，置门以节水势”（《旧唐书·玄宗纪》）；天宝初李齐物开砥柱之险以通流运（《旧唐书·李齐物传》）；天宝元年“陕郡太守韦坚引浐水开广运潭于望春亭之东，以通河、渭；京兆尹韩朝宗又分渭水入自金光门，置潭于西市之两衙，以貯材木。”（《旧唐书·玄宗纪》）广德二年刘宴疏浚汴水以通遭运（《资治通鉴》卷二二三）。至于中唐杜佑等人开河事，钱起已无由预悉。玩索钱起诗中有“河流引关外，国用贍秦中。有诏许其策，随山兴此功。连云积石阻，计日安波通。飞棹转年谷，利人胜岁丰”等语，与范安及、李齐物、韦坚、韩朝宗等人治水开河事不合。另据《旧唐书·刘宴传》载：“时新承兵戈之后，中外艰食，京师米价斗至一千，官府无兼时之积，禁军乏食，畿县百姓乃授穗以供之。晏受命后，以转运为己任，凡所经历，必究利病之由。至江淮，以书遗元载曰：‘浮于淮、泗……涉茱萸、浚泽，遥瞻淮甸，步步探讨，知昔人用心，则潭、衡、桂阳必多积谷，关辅汲汲，只缘兵粮。漕引瀟、湘、洞庭，万里几日，沧波挂席，西指长安。三秦之人，待

此而饱；六军之众，待此而强……’。自此每岁运米数十万石以济关中（秦中）。’与钱诗中所谓“河流引关外，国用贍秦中（关中）”非常吻合。又，《资治通鉴》卷二二三谓：“自丧乱以来，汴水堙废，漕运者自江、汉抵梁、洋，遇险劳费。三月己酉，以太子宾客刘晏为河南、江淮以来转运使，议开汴水。……自是每岁运米数十万石以给关中，唐世推漕运之能者，推晏为首……”卢判官殆刘晏之下属，代晏入京秉事者。因系此诗于广德二年。

《乐游苑晴望上中书李侍郎》（《钱考功集》卷八，《全唐诗》卷二三九）乾元二年至上元元年之间（759—760年）。

钱起诗中之中书李侍郎乃李揆。检《新唐书·宰相表中》可知，从天宝末至建中末的近三十年中，李姓宰相计有：李麟（宪部尚书）、李岷（吏部尚书）、李揆（中书侍郎）、李适（中书令）、李岷（黄门侍郎）、李忠臣（淮西节度使、检校司空）等六人次，而中书李侍郎仅揆一人，故知钱起诗中之中书李侍郎当即李揆。据《新唐书·宰相表》可知李揆为中书侍郎之时间乃乾元二年至上元二年之间，而揆于上元二年二月即因与兵部侍郎吕缙卿齟齬，被贬为袁州长史。《旧唐书·李揆传》称“缙密疏自陈，乃贬（揆）莱州长史同正员。”但《旧唐书·肃宗纪》上元二年下曰：“二月癸未，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李揆贬为袁州长史。”与《新唐书·宰相表》所记同，可见《旧唐书·李揆传》所记有误。参合钱起诗中有：“爽气朝来万里清，凭高一望九秋轻。不知凤诏霖初霁，但觉尧天日转明。……遥想青云丞相府，何时开阁引书生。”则知李揆已由中书舍人晋升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了，不然钱诗中“凤诏”、“丞相府”、“开阁引书生”是无从说起的。按乾元末上元初，钱起还在蓝田低级地方官任上，冀李揆援手引拔之意甚殷切，这与诗中情调非常切合。

《同王铜起居程浩郎中韩翊舍人题安国寺用上人院》（《钱考功集》卷八，《全唐诗》卷二三九）建中四年至贞元初。

王綰，据岑仲勉《郎官石柱题名新考订》“左司郎中”里有王綰，附考语：“《宋僧传》一五《藏用传》左司正郎王綰（今见吏外），正郎，郎中也。”岑仲勉又在同书中“司勋员外郎”钱起名下注：“代宗时，寻起同王綰和诗，起殆终于大历末或德宗初。”可知岑所谓钱与王綰和诗即指这首诗。程浩；《全唐文》卷四四三辑其文三篇，小传云：“浩，代宋朝官驾部郎中。”极简略。岑仲勉《郎官石柱题名新考订》谓程浩为礼部郎，注谓：

“《宝刻丛编》一〇《薛嵩碑》，礼部郎中程浩撰，大历八年立，同书七《马璘新庙碑》，礼部郎中程浩撰，大历十四年立。拓本天宝十四年《云公故夫人独孤氏志》题：‘通直郎行海南府洛阳县主簿程浩撰。’后六人（指裴朏、姚子期、高盖、裴遵庆、杨尖、程浩）仕德宗时。”而韩翃之事迹，姚合《极玄集》卷下云：“韩翃，字君平，南阳人，天宝十三载进士。以寒食诗受知德宗，官至中书舍人。”要算较早的资料了。韩翃为中书舍人还有一段有趣的插曲：“李相勉镇夷门，又署（韩翃）为幕吏。时韩已迟暮，同职皆新进后生，不能知韩……唯末职韦巡官者，亦知名士，与韩独善。一日，夜将半，韦扣门急，韩出见之，贺曰：‘员外除驾部郎中、知制诰。’韩大愕然曰：‘必无此事，定误矣。’韦就座曰：‘留邸状报制诰阙人，中书两进名，御笔不点出，又请之，且求圣旨所与，德批曰：‘与韩翃。’时有与翃同姓名者，为江淮刺史。又具二人同进。御笔复批曰：‘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又批曰：‘与此韩翃。’“……时建中初也。”（孟棻《本事诗·情感》）按韩翃受知于德宗，于建中初官驾部郎中，而擢升为中书舍人当在此后之建中末、贞元初之事了。因系钱起此诗于建中四年至贞元初之际，这是钱起诗集中较晚的作品中了。诗中作者犹称“狂夫入室无余事，唯与天花一笑同。”诗人精神尚好，身体颇健。据此诗可知钱起之卒年当在贞元初年稍后，亦可谓高

龄矣。

《送张参及第还家》（《钱考功集》卷十，《全唐诗》卷二三九）天宝十一、二载间。

张参之事迹略见于唐人李肇《国史补》下：“张参为国子司业，年老，常手写九经，以谓读书不如写书。”《全唐文》卷四五八辑其文《五经文字序例》一篇，小传云：“参，大历朝官户部郎中，历国子司业。”《旧唐书·李勉传》：“勉坦率素淡，……其在大官，礼贤下士，终始尽心。以名士李巡、张参为判官，卒于幕，三岁之内，每遇宴饮，必设虚位于筵次，陈膳执爵，辞色悽惻，论者美之。”按李勉于大历二年入朝拜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曾“候太学”，彼时张参为国子司业，当与李勉相识。岑仲勉《郎官石柱题名新考订》谓张参尝为户部郎中。今按孟浩然诗集中有《送张参明经举兼向泾州觐省》诗（《全唐诗》卷一六〇）云：“十五彩衣年，承欢慈母前。孝廉因岁贡，怀桔向秦川……”则知张参早年即以孝廉为州县所举，旋即返乡省亲。钱诗云：“太学三年闻琢玉，东堂一举早成名。借问还家何处好？玉人含笑下机迎。”则钱起赋诗之时，张参早已年长成家。钱起诗中仅有赞誉对方之词而无功名慨叹，且送别之地又在长安，当为钱起释褐为秘书省校书郎在长安之时，因系此诗于钱起刚入仕途之天宝十一、二载间。若系此诗于广德年间钱起入省为郎时之作，又与张参经历不合。孟浩然最后一次离开长安时为开元二十二年，（详谭优学《唐诗人行年考·孟浩然行止考实》），彼时张参年约十五，若系钱诗于天宝十一、二载，张参不过刚过三十；倘系钱诗于广德元、二年，则张参已四十多岁，揆之情理是绝不可能的，也与钱诗中“玉人”格调扞格。

作者工作单位：四川省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